

隨園文庫

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吳敬梓研究 中冊

陳美林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资助出版

陈美林 著

吴敬梓研究 中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论王冕·····	(635)
论周进·····	(644)
论范进·····	(651)
论严大位、严大育·····	(658)
论王德、王仁·····	(671)
论汤奉、汤奏(附汤由、汤实)·····	(677)
论王惠·····	(691)
论鲁氏父女·····	(699)
论娄琤、娄瓚·····	(708)
论杨执中与权勿用·····	(716)
论蘧祐及其子孙·····	(724)
论马静·····	(732)
论匡迥·····	(741)
论三“牛”(布衣、浦郎、玉圃)·····	(749)
论向鼎与鲍文卿·····	(757)
论倪霜峰父子·····	(764)
论杜倩·····	(772)
论杜仪·····	(787)
论庄尚志·····	(803)
论虞育德·····	(814)
论迟均·····	(828)

论萧浩父子·····	(837)
论三盐商(万雪斋、宋为富、方杓)·····	(845)
论四女性(沈琼枝、赵姨娘、王太太、聘娘)·····	(852)
论余特、余持(附余敷、余殷)·····	(861)
论王蕴·····	(872)
论虞梁·····	(881)
论凤鸣岐·····	(891)
论四客(盖宽、季遐年、王太、荆元)·····	(904)
二百余年来《儒林外史》研究之回顾·····	(913)
附:20世纪《儒林外史》研究之回顾(摘录)·····	(940)
撰写《〈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思考	
——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五十周年·····	(942)
撰写《〈儒林外史〉研究史》的再思考·····	(962)
论《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	
——论《〈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979)
关于深入研究吴敬梓的几点意见·····	(992)
论《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	(996)
论《儒林外史》齐省堂评·····	(1013)
论《儒林外史》张文虎评·····	(1028)
论《儒林外史》黄小田评·····	(1043)
略评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	(1056)
鲁迅与吴敬梓·····	(1080)

20 世纪《儒林外史》主题探讨之回顾

——纪念吴敬梓诞辰三百周年 (1090)

20 世纪吴敬梓思想研究评述 (1108)

人文版《儒林外史》前言有四稿 (1126)

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 (1131)

再论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 (1147)

“铸鼎像物”，“遗貌取神”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研究之回顾 (1165)

“兄友弟恭”的理想与“兄弟参商”的现实

——《儒林外史》兄弟群像研究之回顾 (1185)

吴敬梓思想面貌寻踪记略

——吴敬梓思想构成研究之回顾 (1200)

跋涉“儒林”三十载

——《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跋 (1216)

“知人论世”、“见从己出”和“法不前定”

——《吴敬梓研究》出版二十周年回顾 (1228)

“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

——以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回顾 (1240)

“设情以位体”

——回顾《吴敬梓评传》出版十五周年 (1262)

论 王 冕

—

王冕的故事，仅见于第一回，即《儒林外史》的“楔子”。

王冕，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元代末季著名的诗人、画家，生卒年代大约为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至正十九年(1359)。字元章，号煮石道者、闲散大夫、饭牛翁、会稽外史、会稽山农、梅花屋主、竹斋生、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老龙、老村等，浙江诸暨人。《明史》卷二八五有传，极简略。此外，元徐显^①、明宋濂^②、清朱彝尊^③均为之作传；其他如焦竑《国朝征献录》卷一一六、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等著作中亦有王冕传；一些笔记如陆容《菽园杂记》、叶盛《水东日记》、郎瑛《七修类稿》等作品中均有关于王冕事迹的记载。

但是，吴敬梓笔下的王冕，虽然以传记中的王冕为原型，但已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王冕，而是文学形象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一旦被作家采撷到文学作品中、被塑造成文学形象之后，必然与其原来的面貌有所不同。作家总是顺从文学作品本身的规律，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他，凭自己的想像力去丰富他，靠自己的判断力去修剪他。这种对历史人物事迹的增饰与芟除，

① 《稗史集传·王冕》。

② 《宋学士文集·王冕传》。

③ 《曝书亭集·王冕传》。

正反映了作家的审美情趣,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因而作为文学形象与作为历史人物,二者是有所不同的。对于文学形象的王冕,我们只能依赖文学作品的本身去分析他,历史人物王冕的某些事迹,只能做为参证,而不能处处以之去推求文学形象王冕。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经从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中剪裁了不少片断,糅合到自己所创作的文学形象中来。然而,他们大都已改变了姓名,更换了身份。唯独对于历史人物王冕,则仍然袭用其原名,这在《儒林外史》中还是仅见的。特别是,做为文学形象的王冕又是出现在作品开宗明义的第一回“楔子”之中,这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楔子”原先出现在元杂剧中,用在一本四折之前,以介绍主要角色和情节梗概;亦有益于折与折之间,作为情节的过渡。其后,小说中也有用“楔子”的,如金圣叹删改《水浒》,将原本的引首和第一回合并为“楔子”,认为“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的确,他结合《水浒》的具体内容,对“楔子”做了详细诠释,他说:“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在他看来,“楔子”无疑是引发情节的一种艺术手段。

但是,《儒林外史》中的“楔子”,所写的人物在后文中既未曾出现,也未曾被提及;所叙的故事似亦与后文既无继续,又无关联。它的作用显然与金圣叹所说不同。从《儒林外史》整部作品来考察,不难发现,它的“楔子”其实只是作者吴敬梓对现实社会的议论,这种议论中既透露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又显示了作品思想主旨所在。本回回目“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就是最好的说明。文学形象王冕既是出现在“敷陈大义”的“楔子”中,又是做为“隐括全文”的“名流”,可见作者吴敬梓是如何看重

这一文学形象的意义。

二

王冕生活时代的现实情景如何呢？当时一般士人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吴敬梓在王冕出场之前，通过一首《蝶恋花》词先行作了概括的交代：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接着，又用散文语言对此词作了一番直抒胸臆的倾诉：“人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王冕二十岁左右时曾去山东济南卖画。一日闲坐，“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叹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乃拴束行李回到故乡。回乡六年，母亲病死。“服阙之后，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又隔了数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在这兵荒马乱、改朝换代之际，士人追逐功名富贵的心理状态依然普遍存在。吴敬梓曾描绘了改朝之前，七泖湖畔不知姓名的“三个人”的聚会，虽然他们谈论的是危老先生危素，然而暴露出的却是他们自己热衷功名、切望攀结达官显宦的心态：胖子

钦羡危老先生的富贵——新买的住宅值得二千两银子；瘦子则倾倒于危素的“名位”——“县尊”是他的门生；胡子则思虑着危素飞黄腾达的前程——皇上亲自送他出城，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各自设计如何攀结危素的途径，“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这三个人，作者没有写出他们的姓名，此非“三个人”无名无姓，而是因为此类人物滔滔皆是，不必一一出其姓名，写出此三人，就写尽了与此三人类似的无数士人来。在小说的正文中，此类士人正多，彼时方一一交代他们的姓氏、出处。此“三个人”正是后文中无数士人的先驱和影子。

换代之后，朱元璋即位，是为太祖皇帝，“天下一统”，似乎是“乡村人各安居乐业”。然而“到了洪武四年”，“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对此，作者在“楔子”中并未展开描绘，但却通过王冕之口予以否定，说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的确，以“功名富贵”使士人“荣身”，这正是封建王朝羁縻士人的手段，也正是这种手段，使得广大士子如颠似狂地追逐功名富贵。小说正文中对此多有揭橥，而作者先于“楔子”中借王冕的言论予以否定。作者假借象征牢狱的星座贯索与象征文运的星座文昌的异常现象，预示了人世间这种变故，而又通过王冕之口说破：“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这正暗示了小说正文中描写到的统治阶级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现实！

这就是王冕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是当时士人心态和命运的形象写照。

三

在这样污浊的氛围中，王冕出场了。吴敬梓在《蝶恋花》一词的诠释文字之后，紧接着又说：“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

出了一个嵒崎磊落的人。”用“嵒崎磊落”来形容王冕，显然是肯定他的特立独行、不同流俗。这与上文“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相回映，更衬托出王冕的不寻常。作者选择了放牛、读书、学画、向吴王进言等情节，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王冕的超脱时俗之处。

据宋濂、朱彝尊所记，王冕之所以放牛，均由“父命”所遣。吴敬梓却安排王冕于七岁时丧父，母亲做女工供他读书。三年之后，因“年岁不好，柴米又贵”，才不得不令其去隔壁秦老家放牛。王冕善体亲意，说坐在学堂里也闷，不如放牛快活；如要读书，也可带几本去读。这番言语既宽慰了慈母，又述明了志向。一个恬淡孝谨的少年形象就突兀呈现在读者面前。

王冕果然带书去读了。宋《传》说他“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朱《传》也说“潜入塾听村童诵书”。当时教者所授、学者所习，必为朝廷功令所规定的四书五经。但《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却是聚钱“买几本旧书”来看，这显然非“学舍”所授。后文中作者明白写出，他所常读的乃是“古人的诗文”。可见作者要写明的是幼年时代的王冕，聪明未曾受到“圣人之教”的蒙蔽；相反，他的心灵却受到抒情诗文的启迪。

正因为如此，王冕方始能在放牛之际置身于湖光山色之中时，感受到大自然景色的美好，全身心地陶冶在其中：

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这样清新的景色，不能不使王冕触发起“人在画图中”的联想。

自然，湖光山色之美是客观存在，但要能欣赏它的美，受到它的熏染，却有待于人的心灵之美。可以说七泖湖“清水出芙蓉”般的景色，正映射出王冕“天然去雕饰”的心灵。

由此，王冕一心想重现这美好的自然，他不读书而学画了。根据徐显、宋濂、朱彝尊所记，历史人物王冕以擅长画梅而著称，但在吴敬梓笔下，他却学画荷花。这显然是寄寓着“皤然泥而不滓者”^①的深意。屈原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②，也显然令他心仪不已。徐《传》说他“着高檐帽，被绿蓑衣”，人“以为狂生”，朱《传》所记与此相同，宋《传》更为简略，仅说他“自被古冠服”。而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明白地写道，他按照《楚辞图》上屈原的衣冠，自造穿戴，用牛车载了母亲，“到处玩耍”。虽然有三五村童“跟着他笑”，但秦老却认为他的举止“如此不俗”，更是“敬他、爱他”。这分明暗示王冕能从“看不破”功名富贵的士人圈子中跳脱出来，出污泥而不染。

正因为如此，吴王求他“指示”平天下之策，他就告诫吴王：“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其实，此语实出自朱元璋之口。据《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七，己亥年（1359）正月乙巳日，朱元璋谕诸将，有云“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吴敬梓将此语移来由王冕口中说出，显然是为了突出他的谋国之忠。然而，吴王即帝位之后，许多措施必定不得人心，虽然小说中只拈出实行八股取士之法这一条，但已令王冕深感失望。因此听说朝廷要征聘他为“咨议参军”时，他则“连夜逃往会稽山中”，“久矣不知去向了”。关于授王冕任咨议参军

① 《史记·屈原列传》。

② 《离骚》。

之职一说，徐《传》未曾提及，宋《传》与朱《传》所记略有不同。而吴敬梓却写道：“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一表白，既是为了清洗他人加给王冕的污垢，又表明了作者不愿为官的志尚。

四

吴敬梓不仅描绘了王冕心灵之美好、行为之脱俗，而且还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丑恶心灵的鄙视。这从他对待不知姓名的“三个人”以及时知县、危素等人的态度中可以觐知。

在有关王冕的传记中，未曾出现小说中不知姓名的“三个人”；至于危素其人，朱《传》中有寥寥数语的记叙，《明史》卷二八五有传，较详。危素，字太朴，元至正年间任经筵检讨，修宋、辽、金三史及注《尔雅》，迁翰林编修，直至礼部尚书。《明史》还称其“为人侃直”。入明之后，朱元璋亦称赞其“老成，有先忧之意”。晚年“谪居和州，守余阙庙”。至于何故被贬和州，《明史》未曾言及。小说中这样写道：

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
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

此非吴敬梓杜撰，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三云：

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时危素太朴当直，对内使云：“老臣危素。”内使复命。上默然。翌日传旨令素余阙墓烧香。盖余、危皆元臣，余为元死节。盖厌其自称老臣，故以愧之。

可见吴敬梓在塑造危素这一形象时，也是有所本的。不过，他并未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不但从正史也从笔记中选择素材，予以艺术加工，以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从而敷衍出一篇锦绣文章来。作者为了写危素，先写“三个人”。“三个人”的活动，是在美好的湖光山色之旁。然而，他们句句离不开“危老先生”，语语脱不出功名富贵，极为庸俗不堪，这就自然形成了人与环境的反差。对同在绿草地上坐着的王冕，他们视而不见，旁若无人，一味地高谈阔论，而王冕却在一旁冷眼观之，一语不发，这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烘托出王冕对这“三个人”的无比厌腻。

此“三个人”亮相，显然是为危老先生出场而设计。然而在写了“三个人”之后，并未及时推出危老先生，又写了诸暨县的翟头役。但他的上场依然是为危素出场而安排的。知县时仁为了巴结老师危素，派翟头役去要王冕——此时已成为“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作二十四幅花卉送给危素，“作候问之礼”。王冕之所以允其所请，乃是“屈不过秦老的情”；然而却不题款识，这正表明他不愿攀结官场的态度。直到此际，危素方才登场表演。作者拈出几个细节，着重地表现他的不学无术却又执著功名的心性。不知此画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正暴露出他的见识平庸；论及“如此贤士”王冕，又只着眼于“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更剥露了他的势利嘴脸。他要笼络王冕，时仁自然奉承，于是翟头役奉命前去邀约。偏偏王冕不愿前往，尽管头役威逼有加，王冕依然冷面对之，不为所动。时仁无奈，只得亲自下乡敦请——自然，时仁能如此行事，也非容易，请看作者入骨三分的描写：

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叫了来见老师，
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

他。……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到：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到：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文字不多，却把时仁反复变幻的心机和盘托出。然而，王冕既然冷心绝之，不管时仁恼羞成怒，早已避走出门，终于拒而不见。自然，也就不曾与声势显赫的危老先生相聚。

但王冕并非绝情之人，他只不愿见那些依恃官势、为害百姓、蹂躏地方的官场人物。而在与平民百姓的交往中，则有为农人家的秦老收留他放牛，待之不薄，见他“不俗”，敬爱有加；翟头役威逼他时，秦老又从中斡旋，王冕避祸出走，秦老一直送出村口；家中老母，得其“扶持”，母亲病死，又得其“帮衬”王冕方能治丧；甚至隐居会稽山中，朝廷官员来聘时，也全靠秦老打发。王冕受惠于秦老者实多。王冕对秦老也感戴不已，从济南回乡后随即“拜谢了秦老”。吴敬梓于开宗明义的“楔子”中细细写出此一段情节，寓意十分深刻，与全书结束时所写的“四客”，同样显示了作者已经感受到下层百姓美德之陶冶。

总之，王冕是作者所竭力表彰的人物，置之卷首，有以他作为士人楷模的寓意。他的为人实有“隐括全文”的功能，他的行事也实能起着“敷陈大义”的作用。

（原载《文史知识》1991.7）

论 周 进

周进，是《儒林外史》正文所塑造的第一个重要形象。他的故事主要集中在二、三两回，四、六、七、十八、二十一、五十六回中也曾见其姓氏。

—

吴敬梓笔下的周进，是一个生活在科举社会中的下层知识分子。在他发迹之前，经受了百般困苦，忍受了无数冷遇，但仍然执著于从科举考试谋求出路。偶然的机遇，使他得遂其愿。他的结局似乎是喜剧性的，然而综观其一生，却显然是一个悲剧人物。而造成他一生的悲剧的根源，就是他所生活着的那个实行科举制度的封建社会。

“楔子”中王冕曾经避难离开故乡浙江诸暨去山东济南府，周进正是山东兖州府汶上县人。他出场时已是六十余岁，但功名不就，依然是一个老童生。作者就着重地描写了他在发迹之前的这一段遭遇，从而反映出科举社会中不得上进的下层士子的悲惨命运。

在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要想从科举考试谋求功名富贵，首先得参加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知府主持的府试，通过以后取得童生资格。这才能依次参加科举制度规定的三级考试：每省学院（又称学道、学政、学台）主持的院试，及格后为秀才（生员）。秀才不能做官，因而不能称“老爷”，只能称做“相公”。身份虽不高，但有了参加乡试的资格。要想做官，还得参加三年

一次的乡试。通过之后为举人，这才具备了做官资格，所以对举人，可以称为“老爷”。举人要做官，也须经过一定的考选，所授官职也不高。若想尽快求得高官显职，则须再行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包括殿试），及格后为进士。这就是科举考试的顶点，获得进士资格就可以出仕了。

周进尽管在童生考试中得过第一名，但依然不是秀才。虽在县衙门“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任西席三年，所教的“顾小舍人”都进学成了秀才，自己却反而再无资格继续做他的老师，失业在家。这时县里也未见有任何人家去聘请，终于沦落到薛家集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

作者先行交待清他的这一经历，接着又在具体描写中让读者知道，他之所以能来薛家集任教，则是由夏总甲所推荐，而其被辞退，又是得到夏总甲的默许，“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在此过程中，推波助澜的更是夏总甲的亲家、薛家集士绅“为头的”申祥甫。周进的被聘与被辞，在作者笔下，完全是操纵在地保总甲一类人物手中，其地位的卑下、境遇的恶劣，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周进来到“有百十来人家，都是务农为业”的薛家集上后，吴敬梓又以重笔浓彩继续详描细绘地写出他的辛酸遭遇。在作者笔下，作践他的倒不是集上“务农”的人家，恰恰是他的同类人物——秀才梅玖和举人王惠。

在周进与梅玖相会之前，作者先行描写了一个细节：当戴着旧毡帽、穿着旧直裰、蹬着旧绸鞋的周进走近申祥甫门前时，看门狗就对他吠叫起来。写狗的势利，显然寓意极深，是为了后文写人的势利做一引子。接着，周进进门，劈面就受到“新进学的梅三相”的冷遇。这位新秀才表露出一副不屑与之伍的神态。在交谈之中，又搬出“学校规矩”来，说什么“老友是从来不同小

友序齿的”——所谓“老友”即秀才，“小友”则指童生——当面给周进以侮辱，令其难堪。周进起初还与他“谦让”，听得此言之后“倒不同他让了”。梅玖见状，更加愤恨，就借着“吃斋”一事，对周进假意恭维，百般嘲弄，旁敲侧击，刻毒讥讽，真是谑而为虐了。同席的乡农人家并未懂得梅玖直戳人心的谈话，反而“说他发的利市好”，使得周进“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既不好发作，又得“承谢众人”，受到极大的侮辱，又无以宣泄，只得积蓄心底。

如果说梅玖的秀才身份与周进的童生资格相去不远，因而要急于表明“老友”与“小友”的不同，那么，举人王惠更是目中无人，对童生周进则是视若无物。周进向他“作揖”为礼，他勉强还了个“半礼”，又极其傲慢地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口吻极其蔑视。随即又将侍立一旁的周进丢在一边，旁若无人地问从者：“和尚怎的不见？”此刻周进的难堪是可以想见的。偏偏和尚要他“相陪”这位“前科新中”的“王大爷”说话，王惠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身份，周进退又退不得，辞又辞不掉，只得与他有一搭无一搭地攀谈。当周进恭维他的文章“精妙”时，他则借用“座师”名义自诩“该有鼎元之分”。一旦他的虚荣在得到片刻满足之后，又不耐烦再与周进闲聊，“你只管去批仿，俺还有别的事”，挥之令去。其实，他的“别的事”，只是对着“堆满春台”的鸡、鱼、鸭、肉大嚼一顿；他“也不让周进”一声，让这个老童生呆在一旁饿着肚皮看着他饕餮。等“王大爷”吃完，和尚方送上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这就是老童生的晚餐了，“周进也吃了”。但王举人“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却得由他“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梅玖的挖苦奚落、刻毒讥讽，使他积蓄了无限的愤恨；王惠的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又使他感受到极大的屈辱。这种种折磨人的情绪控制了他的全身心，因而一旦被触动，即刻喷发而出，